

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

傅强 袁正清

摘要 自国际关系界“第三次大辩论”以来，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不过，当前语言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建构了什么，即规则、规范和身份等，而很少关注语言的内在建构机制。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是理解语言建构性内在机制的一把钥匙。因此，本文在借鉴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政治心理学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隐喻与对外政策的分析框架，并以“利益攸关方”和“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隐喻为例，分析了其对对外政策的建构作用，发现两种不同隐喻框定了不同的对外政策。最后，我们从隐喻认知的角度，还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隐喻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隐喻 对外政策 中美关系 利益攸关方 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 语言

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人类任何领域的交流都离不开隐喻思维和隐喻语言”，对外政策话语亦不例外。^① 翻开美国的对外政策历史，隐喻现象十分明显：罗斯福总统对二战后秩序提出了“四警察”设想，艾森豪威尔总

* 傅强，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 本文获得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资助（批准号：002016001），同时感谢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高级讲师潘成鑫以及《外交评论》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谬误由笔者负责。

^① Keith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1994, p. 655.

统在谈及印度支那问题时提出了“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里根总统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小布什总统称某些国家构成“邪恶轴心”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对外政策语言更是如此，从建国初的“另起炉灶”、“一边倒”，到改革开放之后的“韬光养晦”，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从两国建交后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到21世纪初的“利益攸关方”，再到目前的“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型大国关系”的争论，都离不开隐喻的使用。为什么这些对外政策话语充满了隐喻？它们仅仅是一种修辞用法吗？它们对对外政策会有何影响？

对于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我们可以追溯到国际关系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三次大辩论”。当时，反思主义者（reflectivists）、放逐者（exiles）和持不同意见者（dissidents）围绕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展开了广泛辩论。^① 这场辩论激发了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他们逐渐认识到话语对国际关系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作用，话语在赋予“客观”世界意义的过程中构建了“自我”和“他者”，对外政策不过是这种话语身份的反映。^② 同时，政治心理学用实验的方法也印证了话语的建构作用，实验者通过操控不同褒贬性的文本，就可以改变人们对行为体形象的认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政治现实。^③ 随着话语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涉足，并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④ 但是整体而言，当前国际关

^① “Reflectivists”源自1988年国际研究协会主席基欧汉的主席发言，参见James Der Derian, “The (S) pa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mulation, Surveillance, and Spe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3, 1990, p. 295; “Exile”和“Dissident”是阿什利（Richard Ashley）和沃尔克（R. B. J. Walker）的用语，参见R. Ashley and R. B. J. Walker, “Introduction: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 Dissiden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3, 1990, pp. 494-500。这类学者主要包括Nicholas Onuf, Friedrich Kratochwil, Richard Ashley, Michael Shapiro, James Der Derian, R. B. J. Walker等人。

^② J.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254; 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L.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Routledge, 2006; C. Epstein, *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MIT Press, 2008。

^③ Emanuele Castano, Alain Bonascossa and Peter Gries, “National Images as Integrated Schemas: Subliminal Primes of Image Attributes Shape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7, No. 3, 2016, pp. 351-366; David L. Rousseau, *Identifying Threats and Threatening Identiti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 A. Olson and R. H. Fazio, “Implicit Attitude Formation through Classical Condition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2, No. 5, 2001, pp. 413-417。

^④ 参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系研究尤其是国内的话语建构性研究很少关注隐喻，因为长期以来隐喻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而非“原义语言”（literal language），是对正常语言的“背离”。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建构了什么，即分析文本中话语表象（representations）所代表的规则、规范、身份以及与对外政策的关系，而很少关注语言的内在建构机制，即语言是如何建构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世界，而后者对于理解话语建构和话语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隐喻为我们理解话语的内在建构机制提供了一把钥匙，它是语言的“常态”而非“背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建构人们理解的“现实”与对外政策。本文在借鉴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隐喻与对外政策建构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于对中美关系的隐喻分析中。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顾语言视角下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状，指出隐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特别是探讨语言内在建构机制方面的价值，为构建分析框架提供基本的理论背景；第二部分提出一个隐喻与对外政策的逻辑分析框架，即选择性意义建构、框定议程和隐喻推理；第三部分以“利益攸关方”、“修昔底德陷阱”两个隐喻为例解析隐喻的建构作用；第四部分进而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隐喻的建构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

一、语言、隐喻与国际关系

索绪尔的语言任意性思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等先哲的思考和探究，开启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①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世界的创造者”，而

^①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不存在内在联系，维特根斯坦认为那些和语言编制成一片的活动共同构成了“语言游戏”，语言不再只是外部的标签，这就使语言具有了本体论价值。德里达通过解构话语来消解中心，福柯则通过对概念知识的考古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建构与依存关系，从而颠覆了现代主义中理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参见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Routledge, 2002;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Pantheon Books, 1972。

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描述客观现实的工具”。^①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界的“第三次大辩论”，语言才登上国际关系研究的舞台，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论述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②

从所借鉴的思想和语言理论来看，语言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言语—行为角度出发，认为“说话即做事”，主要以约翰·奥斯汀和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③ 以尼古拉斯·奥努夫的言语行为与规则、弗里德里克·克拉托克维尔的言语行为与规范以及哥本哈根学派特别是奥利·维夫的言语行为与安全化的研究为代表。第二类是后结构主义，他们主要受德里达、福柯、布迪厄、克里斯蒂娃、厄内斯特·拉克劳等人的影响，坚持语言的本体地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直接关心”^④ 语言价值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里安、夏皮罗、阿什利、沃尔克、坎贝尔、吉姆·乔治、米利肯、爱泼斯坦、汉森和潘成鑫等人。^⑤ 这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某些历史事件或事物的不同话语叙事以及主导话语的变化来揭示和解释身份与对外政策的变化，从而说明话语的建构作用。第三类主要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启发，将国际关系看作“语言游戏”，主要代表人物是菲尔克、达菲和霍华德等人。^⑥ 其基本逻辑是语言建构了规则和语

^① Murray Edelman, “Political Language and Political Realit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18, No. 1, 1985, p. 10.

^② “第三次大辩论”主要是围绕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展开的，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批判物质/理性主义。参见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pp. 611-625; Jim Geor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69-279;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35-254.

^③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2; John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④ K. M. Fierke, “Links Across the Abyss: Language and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Issue 3, 2002, p. 333.

^⑤ 相关研究可参见：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Books, 1989; 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J.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pp. 225-254; C. Epstein, *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Chengxin Pan,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2.

^⑥ 参见 K. M. Fierke, *Changing Strategies: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in Secur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Gavan Dufey, “Language Games: Dialogical Analysis of INF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2, 1998, pp. 271-293; Peter Howard, “Why Not Invade North Korea? Threats, Language Game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 4, 2004, pp. 805-828.

境，而语境又会制约人们对事物和行为的理解，即意义的生成；当行为体通过语言的战略运用来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时，也就改变了行为的意义和游戏本身，从而限制和创造了未来可能和允许的行为。此外，国内学者如孙吉胜、刘永涛等在总结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对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做出了深入的分析。^①

上述研究将语言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是，这些研究对于语言建构现实的内在机制关注相对较少，语言在整体上还是被看作“黑匣子”。例如，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对规则、规范和安全的建构，后结构主义聚焦语言对身份的建构，语言游戏视角突出语言对游戏规则的建构，这些基本上以语言的建构性为假设和基础，但是很少关心语言是如何建构的，即人们如何通过语言来理解所经历的世界，进而这种认知怎样影响身份和对外政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语言建构性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把钥匙。隐喻（metaphor）一词最早出现在雅典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格拉斯》一书中，字面意思是指“把某物从某地带到某地”，因此其本身就是一个隐喻。^② 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思考、讲话和行动中”。^③ 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建构中充满了隐喻，如现实主义的“均势”、“零和游戏”、“软实力”，建构主义中的“身份”、“（规范的）生命周期”、“语言游戏”等等。在对外政策中更是非常普遍，如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里根的“邪恶帝国”、布什的“流氓国家”等等。但是，受亚里士多德等人影响，传统上隐喻只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即一种“相似性比喻”（trope of resemblance），一种“替代”（substitution）。^④ 因此，它不是语言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语言使用中的一种装饰和美化，是对正常语言的一种背离，甚至有时还会很“危险”。^⑤ 因此，除了政治传播研究关注隐喻的修辞功能外，主流的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把隐喻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因为它是“误导的、非理性

^① 参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

^②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translated by George Kenne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9.

^③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7, Issue 8, 1980, p. 453.

^④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translated by Robert Czern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John Costello, Routledge, 2003, p. 1.

^⑤ David Punter, *Metaphor*, Routledge, 2007, p. 12.

的、情绪化的、病态的、原始和荒谬的”。^①即使上述语言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没有将其纳入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②

以乔治·莱考夫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颠覆了这种传统隐喻观，指出隐喻不是对正常语言的背离和反常，而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限制着我们所注意到的事物，强化我们所能看到的方面，并为我们推理提供部分推理框架。”^③具体而言，新的隐喻观具有以下特征：首先，隐喻被看作是一种“跨概念域的映射”，“用一个心理域来理解另外一个心理域”，即源域到靶域的映射。^④“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具有“突出”和“掩藏”两大功能。^⑤这样，事物的意义并不是本质主义的，不是完全客观和绝对的，而是一种来自源域到靶域的投射，是经验性的。^⑥因此，隐喻就具有了认知和建构功能。例如，凯南在长电报中称共产主义是“寄生虫”，艾森豪威尔在解释美国在东南亚外交政策时使用了“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隐喻，这些源域（“寄生虫”和“多米诺骨牌”）的典型特征就会投射到靶域（“共产主义”和“印度支那地缘政治形势”）上，从而建构出靶域的意义。这种新隐喻观越来越得到语言神经理论、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支持。^⑦需要指出的是，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广义隐喻外延包括了明喻（simile）、拟人（personification）、转喻（metonym）、提喻（synecdoche）和类比（analogy），因为在认知层面它们都是通过映射

① Paul Chilton,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Peter Lang, 1996, pp. 1-2.

② 菲尔克的研究已经注意到隐喻对于意义的建构作用，但是很明显她主要借助“游戏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参见孙吉胜：《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37—45页；K. M. Fierke, *Changing Games, Changing Strategies: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in Security*。此外，孙吉胜的语言分析框架在词汇层面提到了隐喻在建构中的作用，但是基本上还是将隐喻视为语言的“修饰”，是使用者“对语言使用的巧妙之处”，旨在产生“特殊意义效果”。参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第146页。

③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Cognitive Science*, Vol. 4, Issue 2, 1980, p. 195; George Lakoff,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in Martin Pütz, ed., *Thirty Years of Linguistic Evolution*, John Benjamin, 1992, p. 481.

④ 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载盖拉茨主编：《认知语言学基础》，邵军航、杨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99、203—204页。

⑤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5, 10.

⑥ 关于 metaphor、truth 和 experientialist 的讨论，可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pp. 185-194.

⑦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 Raymond Gibbs,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获得对靶域的理解。^①

其次，隐喻被看作是普遍的认知现象，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莱考夫认为，我们日常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说是隐喻的”。^②人们不但通过“非隐喻概念”理解世界，更依赖于“隐喻概念”理解世界。所谓“非隐喻概念”是指那些与我们经历直接相关、其含义由其自身界定的概念，如“上”、“下”等，而隐喻概念是指那些仅靠其自身经验无法理解，而必须借助其他概念，即对一种事物或经历的理解必须通过另外一种事物或经历而得以理解。^③非隐喻概念比较简单，无法脱离直接经验。但当人们理解抽象和复杂的世界时，就不得不借助隐喻概念了，比如“爱情”、“国家”、“中美关系”。事物越复杂，人们越要依赖隐喻来进行思考。事实上，许多基本的概念，如“时间、数量、状态、变化、行动、动因、目的、手段、属性”等概念，都常常需要采取隐喻性理解。^④

最后，隐喻的存在形式与类型。新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是语言的常态，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但是，为什么我们几乎习焉不察呢？实际上，语言中存在两大类隐喻：“新奇隐喻”和“常规隐喻”。^⑤新奇隐喻与常规隐喻是相对而言的，简单来说，新奇隐喻通常是新出现的隐喻，具有想象力和创新性，能够为我们对事物提供全新的理解，是我们传统上理解的那类“隐喻”。例如，汪洋副总理在2013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将中美关系称为“夫妻”关系，说“我们不能走离婚的路”。^⑥但是，当新奇隐喻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慢慢沉淀为我们语言体系和认知体系的基本元素后，人们在使用它时也就“毫不费力”，以至于没有察觉，新奇隐喻就成为常规隐喻了。^⑦常规隐喻在我们的语言中比比皆是，我们会说“针眼”、“两极世界”、“国际机制”等等。本文分析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属于这一类，该隐喻基于国际

① 隐喻是不同域（between-domain）下的映射，而类比是同域（within-domain）之间的映射。

②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p. 454.

③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p. 195.

④ 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第210页。

⑤ 本文的隐喻分类主要基于莱考夫的文章。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分类，如德鲁拉克（Peter Drulak）将隐喻分为“沉淀的”（sedimented）、“常规的”（conventional）和“非常规的”（unconventional）三类。以上分类可参见：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pp. 453-486；Peter Drulak, “Motion, Container and Equilibrium: Metaphors in the Discourse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4, 2006, p. 507.

⑥ 吴庆才、德永健：《汪洋幽默“首秀”以夫妻妙喻中美经济关系》，中国新闻网，2013年7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11/5027616.shtml>。

⑦ 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第260页。

关系中最常见的“根隐喻”，即“国家是人”，因为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理解为“人”之后才会有各种“关系”如伙伴、敌人等，还有“关系”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新旧之分。由于广泛、持久的使用，人们已经几乎觉察不到它们的新奇性。实际上，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语言都是常规隐喻，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字面意义的语言，如“上”、“下”、“前”、“后”等等。^① 离开常规隐喻，我们几乎无法表达想法。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影响，隐喻的巨大建构价值开始被其他学科学者所重视。在国际关系界，隐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但在西方发展迅速。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注隐喻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建构中的作用。例如，罗纳德·戴博特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观念已经成为束缚人们认知的“眼罩”（blinder），要想打破这种观念上的桎梏，可以通过隐喻的分析和使用对社会世界进行“治疗性再描述”，因为隐喻建构人们的认知，而且历史上重大的“观念革命”无不是通过使用创造性隐喻推动的。^② 利特尔主要回顾了摩根索、布尔、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理论建构中对“均势”隐喻的使用，他认为“均势”与其说是不可改变的规律，还不如说是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马克斯等人指出隐喻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普遍现象，“隐喻框定和描述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视角”。布赫指出规范“生命周期”隐喻将规范传播视为机械和自动化的过程，造成规范传播叙事中施动性的缺失。^③ 另外一类研究主要关注隐喻与国际关系现象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关系。例如，莱考夫认为，老布什总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通过一系列隐喻将人们引入“英雄匡扶正义”的认知框架，进而为发动战争提供合法性。史木寇着重考察了隐喻在外交政策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比较了历史类比和隐喻的不同作用方式。奇尔顿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安全隐喻，指出“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框定了整个政策叙事的概念隐喻。大卫·马梯默研究了隐喻如何建构国际安全中的“扩散”问题以及它对扩散政策的影响。德鲁拉克等人分析了隐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建构作用，斯宾塞等人还分析了恐怖主义建构中的隐喻

^① 当然，这些字面意思的词语在不同语境下很可能成为隐喻，比如“中国经济上去了”，这里的“上”是一种方向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其背后的根隐喻是“上去是好事”。

^② Ronald Deibert, “‘Exorcismus Theoriae’: Pragmatism, Metaphors and the Return of the Medieval in IR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1997, pp. 167-192.

^③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ichael Marks,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79; Bernd Bucher, “Acting Abstractions: Metaphors,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the Eclipse of Agenc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3, 2014, pp. 742-765.

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影响。^①此外，国内少数学者近年也开始关注隐喻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尝试从隐喻视角分析和解读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②这些隐喻分析丰富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拓展空间。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隐喻研究或是聚焦在理论层面，或是集中在分析特定现象（或领域）中的具体隐喻，缺乏分析隐喻与对外政策之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因此，下文我们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搭建一个这样的框架。

二、隐喻、现实与对外政策建构

“没有隐喻的政治就如同失去水的鱼儿。”^③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使人们不得不借助那些更具体、熟悉和简单的概念来理解国际关系。不但普通民众需要借助隐喻，即使是那些相对熟悉国际事务的政府官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描述和阐释国际政治事件时也经常借助隐喻。隐喻“可以启动观众预设、框定议题，能够建立共同体和组织合作，能够激起分歧与冲突，能够争取支持和导致对立”。^④因此，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方法，隐喻分析是人们认识和审视所理解的现实与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

当前，隐喻分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行为体为中心，另一类以结

① George Lakoff,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Keith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p. 655-671; Paul Chilton,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David Mutimer, “Reimagining Security: The Metaphors of Proliferation”,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87-222; Peter Drulak, “Motion, Container and Equilibrium: Metaphors in the Discourse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499-531; Rainer Hulsse, “Imagine the EU: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a Supra-Nationalist Ident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4, 2006, pp. 396-421; Alexander Spenc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rrorism: Media, Metaph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5, No. 3, 2012, pp. 393-419; Rainer Hulsse and Alexander Spencer, “The Metaphor of Terror: Terrorism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6, 2008, pp. 571-592.

② 林民旺：《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国际论坛》，2007年第2期，第15—19页；陈勇：《“巨人的碰撞”——中美关系政治隐喻解读》，《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第229—231页。

③ Seth Thompson, “Politics without Metaphors Is Like a Fish without Water”, in Jeffrey Scott Mio and Albert N. Katz, eds., *Metaphor: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pp. 185-201.

④ Francis Beer and Christ'l De Landsheer, *Metaphorical World Politics*,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

构为中心。^①前者主要是通过隐喻分析来揭示隐喻使用者背后隐藏的议程、企图和想法，其研究思路与批判话语分析基本一致。^②后者则主要关心隐喻是如何建构事实的，而不太关心行为体使用某些隐喻的动因，这与上文中的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基本一致，即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话语对身份的建构而很少涉及谁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些话语。尽管不排除第一类取向，但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后一种，即在对外政策话语中隐喻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我们根据隐喻建构对外政策的机制描绘出隐喻对对外政策的建构框架，即选择性意义建构、框定议程和隐喻推理，如图-1所示：



图-1 隐喻与对外政策建构

第一，选择性意义建构。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决策者需要借助隐喻建构意义从而获得对事实的理解。隐喻建构意义的方式是“映射”，即当人们使用隐喻理解国际关系现象时，源域特征通过映射投射到靶域从而获得靶域的意义。不过，这种对靶域的理解只能是部分而非全部，因为不存在某个单一、具体的概念和某个抽象的概念是完全精确的和一致的。正如默里指出：“每个隐喻都在强化某种选择性认识而忽略其他，从而帮助将注意力聚焦在所支持的公共政策的期望结果上，忽略那些不想要的、无法想象的或者不相关的前提和后果。每个隐喻都可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强调人们想要的东西，避开不希望面对的东西。”^③

隐喻的这种选择性意义建构常常会引起国际事件的理解性冲突，这一点在国际政治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2001年4月1日中美之间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美军EP-3侦察机迫降海南岛，一

^① Alexander Spenc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rrorism: Media, Metaph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p. 397-398.

^② 批判话语分析可参见：Ruth Wodak,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age, 2013; Norman Fairclough,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Routledge, 2003; T. Van Dijk, ed.,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Volume 1, Disciplines of Discourse*, Academic Press, 1985.

^③ Murray Edelman,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 Academic Press, 1971, p. 67.

场外交危机随之而来。中方要求美方明确道歉，而这在美方看来是不理智的、不能被接受的。斯林格兰德等人通过对中美主流报纸的对比分析发现，隐喻造就了中美两国对事件含义的不同界定，进而影响了双方不同的外交诉求。^①在危机过程中，两国都使用了“战争”（“battles”、“bully”，“挑衅”、“打击”等）、“旅途”（“on track”、“roadblock”，“发展”、“一道”等）和“经济”（“cost”、“debt”，“赔偿”、“利益”）三个范畴下的隐喻，但这三种认知模式都不必然意味着道歉。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使用了大量“游戏”和“技术”范畴的隐喻，而中方大量使用了“受害者”和“民事关系”范畴的隐喻。对于美方来说，游戏的赢家和输家都不需要有罪恶感，不需要被惩罚，更没有必要道歉。技术性隐喻的潜台词就是减少感情色彩，冷静控制局势，不让对方将事件上纲上线。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媒体使用的民事关系隐喻有“傲慢”、“面子”等，这种认知要求将人际之间的规范迁移到国家间行为，暗含道歉的重要性。典型的受害人隐喻有“强盗”、“任人宰割”、“侵犯”和“践踏”等，这就意味着美方需要给受害者一个道歉。

第二，框定议程。人们一旦接受某种隐喻，就等于在大脑内“植入”了该框架，会不可避免地按照这一框架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从而左右政治议程。这在美国两党施政纲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日常新闻中，我们发现美国两党在各自政治议题上的立场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前后矛盾。例如，共和党以保护生命权为由而反对任何堕胎，但却又支持死刑，支持减税，又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相比之下，民主党则支持堕胎、支持累进增税、减少国防开支。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的逻辑是框定两党思维逻辑的隐喻造成的。莱考夫研究发现，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实背后都源自一个共同的概念隐喻，即“国家是家庭”，区别在于共和党倾向于“严父型家庭”认知模式，而民主党则倾向“慈爱型家庭”认知模式。^②在“严父型家庭”模式下，外面的世界被描述成危险和困难的，父亲是家庭的权威，需要强大的军队来保护家庭，而孩子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而且，世界是危险复杂的，孩子要学会自助，孩子长大之后，家长就不要插手干预。此外，追求个人利益也是高尚的行为，获得幸福就是获得财富，好孩子通过努力获得的财富是对自己努力的回报，值得表扬而不是惩罚。相比之下，在“慈爱型家

^① Edward Slingerland, Eric Blanchard and Lyn Boyd-Judson, "Collision with China: Conceptual Metaphor Analysis, Somatic Marking, and the EP-3 Incid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07, pp. 53-77.

^② George Lakoff, *Moral Politics: What Conservatives Know that Liberals Do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庭”认知模式下，如果孩子犯错，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做一些好事来补偿一下。这种家庭更看重同情心和责任，家长应该懂得孩子哭喊时需要什么，理解孩子的感受，而孩子也需要学习对他人的同情心。家长对孩子负有完全责任，而孩子也要学着对他人负责，最高的道义莫过于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关怀的人。这两种家庭认知模式很好地解释了美国两党的政治行为。最近的研究也再次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行为立场仍在受这两种家庭隐喻模式的制约。^①

第三，隐喻推理。隐喻推理与形式逻辑推理不同，没有严格的规则或推导公式，是旧的隐喻理解退却为背景而新的隐喻理解出现的过程。它通常涉及下面一个或两个步骤：一是在原有隐喻框架下寻找新的蕴涵，二是从一个隐喻过渡到一个新的隐喻，从而改变对其理解和体验，而这两个步骤通常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②举个例子，“中美是夫妻关系”的隐喻实际上包含很多内容，如“夫妻吵架很正常”，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中美出现摩擦很正常”的结论。实际上，隐喻推理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基本上是以“隐形”的方式发挥作用。^③斯坦福大学蒂博多等人的心理学实验发现，隐喻对于复杂事物的推理具有巨大作用，仅仅某个隐喻的使用就会引起人们对于如何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④理查德·劳等人也发现，公众依赖于隐喻推理来选择政策，人们选择的政策方案与隐喻使用是一致的，即便那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也不例外。^⑤在国际关系领域同样如此，例如帕里斯研究发现，美国对如何应对科索沃危机的政策讨论实际上是一场“隐喻之战”，各方通过不同隐喻的使用推导出相应的对外政策，^⑥当科索沃

① 参见：A. Cienki, “Metaphor in the ‘Strict Father’ and ‘Nurturant Parent’ Cognitive Models: Theoretical Issues Raised in an Empirical Study”,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16, Issue 2, 2005, pp. 279-312; G. Deason and M. H. Gonzales, “Moral Politics in the 2008 Convention Acceptance Speech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4, No. 3, 2012, pp. 254-268; Jennifer Moses and Marti Gonzales, “Strong Candidate, Nurturant Candidate: Moral Language in Presidential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6, No. 5, 2015, pp. 379-397.

② Mark Johnson, “Metaphorical Reasoning”,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1, Issue 3, 1983, p. 377.

③ L. D. Bougher, “The Case for Metaphor in Political Reasoning and Cogni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3, No. 1, 2012, p. 148.

④ P. H. Thibodeau and Boroditsky Lera, “Metaphors We Think with: The Role of Metaphor in Reasoning”, *PLoS ONE*, Vol. 6, No. 2, 2011.

⑤ Richard Lau and Mark Schlesinger, “Policy Frames, Metaphorical Reasoning, and Support for Public Polic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2005, pp. 77-114.

⑥ Roland Paris, “Kosovo and the Metaphor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2002, pp. 423-450.

危机发生时，为了解释科索沃所发生的事件，制定应对策略，美国决策精英使用了“越战”（“越南”、“泥潭”等词汇）、“大屠杀”（“大屠杀”、“种族灭绝”、“集中营”和“希特勒”等词汇）、“慕尼黑”（“绥靖”、“抵抗纳粹侵略”、“慕尼黑”等词汇）和“巴尔干火药桶”（“巴尔干火药桶”）等四类隐喻展开辩论。在科索沃危机初期，克林顿称其为“巴尔干火药桶”，表明其潜在风险，但是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在盟军轰炸的前一天的演讲中他又增加了“慕尼黑”隐喻，进而又使用了“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等隐喻，为美军干预合法化提供理由。相比之下，反对者则在美国国会中批评克林顿所建构的现实不符合科索沃的情况，并有可能将美国拖入另一个“越战泥潭”。这样，通过使用不同的隐喻，辩论双方完成了不同的政策方案的推理。

此外，隐喻类型是影响建构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常规隐喻相比，新奇隐喻与众不同，能够赋予过去、现在的经历、活动、事物和我们的知识、信念以全新的意义，因此更受人们的关注。同时，同域映射的类比要比跨域映射的隐喻对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更明显的影响，因为在历史类比的源域中已经存在之前的政策选择，而隐喻更多的是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范围。^①

三、“利益攸关方”和“修昔底德陷阱”隐喻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间关系的好坏不仅影响各自国家，还会波及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既非盟友，又非敌人。诚然，这种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关系乃全球“最广泛又最复杂、最有希望又最具挑战”的双边关系，^②很难按照敌友来简单归类，但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迫使人们（包括决策者）需要用某种方式理解、界定和观察它，进而确定相应的对外政策，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于人们对事实的认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关于中美关系的隐喻层出不穷，如“中美国”（Chimerica）、“两国集团”（G2）、“全球合作伙伴”（global partner）、“夫妻关系”、“临界点”。下面我们以中美关系中

^① Keith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 664.

^② Cui Tiankai, “Ambassador Cui Tiankai Speaks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9, 2013,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dszl/dshd/t1087099.htm>.

的两个典型隐喻“利益攸关方”和“修昔底德陷阱”为例进行说明。选择这两个案例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两个隐喻在描述中美关系时被广泛使用；其次，提出这两个隐喻的主要初衷都是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最终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影响迥异，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示隐喻的建构价值。

（一）“利益攸关方”隐喻

“利益攸关方”隐喻是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中提出的，随后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布什政府在2006年3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以国家战略的形式予以确认。^①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美同布什总统会谈时也基本接受了这一隐喻，指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② “利益攸关方”隐喻源自商业领域，是指在企业或项目中有利益关联的一方，它的产生与自由主义商业文化浓厚的美国土壤有密切关系。按照神经语言理论，“利益攸关方”会激活其蕴涵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担风险”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意象，并将其运用到中美关系上。“利益攸关方”与美国鹰派“中国威胁论”话语是对立的，属于神经语言理论所说的“互相抑制”情形，即两者在大脑神经群中是互相抑制的，一方激活后会抑制对方的激活。^③ 下面，我们将按照上面提出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这一隐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建构。

1. 选择性意义建构

从整体上说，“利益攸关方”隐喻映射下的中美关系现实是正面的，强调接触与合作，人们更多地看到或关注中美双方广泛共存的利益。正如布什总统所言，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方也认为美国是通过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④ 例如，2008年中国海军首次赴索马里护航，美方是“欢迎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nssarchive.us/NSSR/2006.pdf>.

^② 王恬、李学江、唐勇：《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6年4月21日，第1版。

^③ George Lakoff, “The Neural Theory of Metaphor”, in Raymond Gibbs,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p. 19.

^④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and President Hu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ipate in Arrival Ceremony”,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04/20060420.html>；倪峰：《从“利益攸关方”到“建设性合作者”——胡锦涛主席访美与中美关系》，《当代世界》，2006年第6期，第13页。

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西尔在国会作证时赞赏“中国在亚丁湾反海盗部署对解决共同的国际关注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①因为在“利益攸关者”的隐喻映射下，护航是中国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而非军力投射和势力扩张。试想如果透过“修昔底德陷阱”框架来看待中国海军参与远洋护航，很可能就会将其解读为军事扩张。同样，当中国主动参与建设中日韩、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地区一体化活动时，也不会被误解为是为了抛开现有秩序而“另起炉灶”，或者把美国排挤出亚洲。中国举办的“六方会谈”也得到美方赞赏，被美方认为是担当国际责任、维护国际秩序而不是一种拖延战术。^②此外，“利益攸关方”隐喻还意味着对之前中美关系中冲突和矛盾的一面重新赋予含义。例如，2015年9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资深顾问詹姆斯·基思指出，“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在地区政治参与方面更加透明、更具包容性。军事方面朝着同样透明方向发展也不容小觑。”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军方保持接触，希望双方关系透明、对等并继续发展”。^③同时，在“利益攸关方”认知框架下，双方存在的不同点与分歧也被认为是正常的，不会朝“敌人”或“陌路人”等负面方向过度解读。正如佐利克所说：“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进行管控，各方能在共同受益的、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找到共同利益。”^④这就如同公司“股东”通过开会解决分歧，中美双方的分歧也应该在长远和共同的利益框架下通过对话与协商而非对抗得到解决。例如，在人权问题上，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时暗示愿意重启之前两国中断的人权对话，2008年杨洁篪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会晤后双方达成谅解并重启对话。^⑤

2. 框定接触与合作议程

按照隐喻“凸显”和“掩盖”的框架特点，“利益攸关方”隐喻将中美

^①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 “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y Scot Marcie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5, 2009,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9, p. 6; Mark McDonald, “China Confirms Its Navy Will Fight Somali Pirat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18/world/africa/18iht-pirates.1.18782636.html>.

^② George W. Bush, “Remarks by President Bush and President Hu Jintao of China”, April 20, 200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https://2001-2009.state.gov/p/eap/rls/ot/64840.htm>.

^③ James Keith, “U. 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aiwan”,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05/09/20050915162659ajesrom0.2257044.html#axzz482vBxJ5u>.

^④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 200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⑤ 中美人权对话始于1990年，到2002年共举行13次，之后对话终止，后于2008年5月恢复。详见Edward Cody, “China Set to Resume Human Rights Dialogu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7,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2/26/AR2008022600903.html>.

双方的注意力聚焦在共同利益而不是寻找分歧上，即使出现分歧焦点也是管控而非渲染。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反映了这种框架作用，该报告的中国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中美如何共同协作共筑全球繁荣，并在开始时就强调“中国过去是反对国际制度的，而今天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常任理事国”，从而将中国框定为国际体系的攸关方。^①事实上，直到小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末，中美双方关系基本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②同时，我们发现，这段时间中美两国间的对话层次和种类也在不断扩大，双方新设立了中美战略对话（2005年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启动）、中美人权对话（2008年恢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9年启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10年启动）等多个部长级以上政府间对话机制。

3. 隐喻推理

“利益攸关方”隐喻属于跨域映射隐喻，就对外政策而言，其隐喻推理虽然也可以产生“从实然到应然”的“规范性跳跃”，从而强烈塑造决策者的政策偏好，但是其推理一般不指向具体的对外政策行为，而是限定了政策的范围。^③当美国将中美关系理解为“利益攸关方”时，意味着中国是当前（美国治下）国际秩序的“局内人”而非“局外人”，因此，该隐喻推理下的对外政策应该是对话、合作性的。例如，在面对汇率、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问题时，美国政府不是采取对抗政策，而是“制定实现长期共同目标的战略并管理两国经济关系的短期挑战”，在2006年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内阁级别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来解决问题、促进合作。^④再比如在安全方面，2009年南海问题开始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当时中国与南海相关各方摩擦增多，同时又和美方发生了所谓“无暇”号干扰事件。对此，2009年7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斯科特·马西尔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谢尔都明确向国会议员指出，与美国自由航行相关的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4884.pdf>.

^② T. Christensen, “Obama and Asia: Confron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94, No. 5, 2015, p. 28.

^③ Martin Rein and Donald Schon, *Frame Reflection: Toward the Resolution of Intractable Policy Controversies*, Basic Books, 1994, p. 94.

^④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U. S. Fact Sheet: Fifth Cabinet-Level Meeting of the U. S. - 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December 5, 2008, <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hp1316.aspx>.

“无暇”号事件和南海领土主权争端是两回事，需要加以区分。对于自由航行和船只安全问题，美国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对话，“相信会有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难题”。而对于岛屿主权争端的担忧将“真诚地向他们提出来”，并注意中国为解决陆上领土争端时“已经采取更加和解的方式”。这表明在南海问题初期，美国政府基本还是在按照“利益攸关方”隐喻推理采取对话沟通的方式解决双方的问题。^①

不过，“利益攸关方”的隐喻推理并非总是正面的，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摩擦。例如，“利益攸关者”意味着中美需要共担责任，而不能“搭便车”，因此，美方要求中方增加投入，多担当国际责任，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来维持国际体系的运行，而中方则强调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中美双方对于“责任”的推理和定义差异，逐渐导致双方尤其是美方开始质疑“利益攸关方”认知模式，从而逐渐瓦解了使用这一隐喻的根基。^②但从目前来看，当年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反，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地区和世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而美方却持反对或消极立场，将其解读为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我们将在下文“修昔底德陷阱”隐喻中对此加以分析。

（二）“修昔底德陷阱”隐喻

由于中美双方在“利益攸关方”隐喻认知框架下对“共同责任”含义产生推理分歧，美方开始质疑中国是否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2009年奥巴马以“改变”为口号赢得选举上台之后，“利益攸关方”隐喻逐渐淡出中美双方的政治话语。^③同时，由于“无暇”号事件、周小川提出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中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上所谓的“粗鲁”和“傲慢”行为等事件，美国政治精英越来越认为中国变得“更强硬”，霸权转移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冲突的话语遂不断发酵。^④在此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这种思维框架进行凝练，在2012年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丁·怀特将该书视为国际关系领域“唯一得

^①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 “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pp. 3-10.

^② 对“利益攸关方”质疑的讨论，参见 Amitai Etzioni,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3, 2011, pp. 539-553.

^③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0年5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中国部分已经没有“利益攸关方”的表述。

^④ 关于美国出现的中国外交变得“更强硬”的话语，可以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到认可的经典之作”。^① 该书记录事件年代久远，但其结论，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却广为流传。^② 这种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必然性，也就构成了“修昔底德陷阱”隐喻的基本含义。“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曾出现在美苏冷战时对两国关系的讨论中，但是人们对这一隐喻的真正关注始于艾利森于2012年8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③ 艾利森将中美关系比作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旨在提醒两国接受历史教训，相互做出调整以包容对方，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之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和2015年两次访美期间，他又分别在《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再度强调要用“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框架看待中美关系，认为中美之间在接下来几十年发生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现在更加可能。^④ 在他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看清中美关系互动的“最佳滤镜”。^⑤ 下面，我们将按照上面提出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这一隐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建构。

1. 选择性意义建构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提出后就引起广泛讨论，被频繁使用，甚至有学者指出它“逐渐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⑥ 以“修昔底德陷阱”隐喻理解中美关系，只能看到负面内容或者对所看到的事实做出负面阐释。按照隐喻映射原理，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对抗”、“恐惧”、“不可避免”和“挑战秩序”等就会投射到中美关系上，构成中美关系的基本内涵，进而重构两国关系的现实。这种意义建构分为三类：一是掩盖事实，使中美积极友好合作的一面成为盲区。在这种“冲突”认知模式下，源域中只有冲突和利益争夺而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潜意识里会忽

① 马丁·怀特：《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载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页；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9页。

③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1, 2012, <http://www.ft.com/intl/cms/s/0/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html#axzz3nICF8uZ8>.

④ Graham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6/07/opinion/obama-and-xi-must-think-broadly-to-avoid-a-classic-trap.html?_r=0;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 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⑤ Belfer Center, “Thucydides Trap Project”, September 22, 2015,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5760/thucydides_trap_project.html.

⑥ 郑永年：《习近平与“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替代》，《联合早报》，2015年9月29日，<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0929-531955>。

略合作的方面，如中美两国在环保、迅猛增加的人员往来、共同抗击传染病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二是对两国之前本已存在的矛盾进行突出强化。比如，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在 80 年代中美蜜月期就一直存在，而且当时的差异要比现在大得多，但鲜有人强调这种差异。然而，在这种新的意义建构映射下，双方的这种差异就容易凸显出来。三是对两国间新发生的事件进行负面解读。比如，美国认为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蓄意破坏”二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将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拉入自己轨道的“政治工具”，因此不但美国自身不参加，而且说服日本也不参加，并对英国等国加入表示愤怒，美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将其解读为挑战现存金融体系的行为。^①实际上，亚投行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中国勇于担责、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不是替代”。^②

2. 框定冲突议程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本身讲述了一个关于崛起国雅典和守成国斯巴达之间为霸权而冲突的故事，因此在这个隐喻框架下中美关系议程自然就会为争夺地区和世界领导权、零和游戏等冲突思维所主导。中美双方的任何举动都会被纳入此框架内讨论，美国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是否在改变现状、挑战美国霸权，而中国则会关注美国是否在围堵和遏制中国。这也就不难理解中美关系议程中安全议题的分量迅速上升，近年来南海问题与网络攻击等议题被反复热炒就是突出的例证。尽管美国官方不赞成用“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来理解中美关系，但是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专家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美国在亚洲的很多行为都是针对中国的。^③此外，中国政府多次呼吁中美两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从侧面说明美方存在这种认知框架。“修昔底德陷阱”框架对美国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破坏效应，使中美两国的防备、恐惧和冲突更显

^① Jane Perlez, “U. S. Opposing China’s Answer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4, A1; Martin Fackler, “Japan, Sticking with U. S., Says It Won’t Join China-Le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15, A6; Nicholas Watt, Paul Lewis and Tania Rranigan, “US Anger at Britain Joining Chinese-led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Guardian*, March 13, 2015,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mar/13/white-house-pointedly-asks-uk-to-use-its-voice-as-part-of-chinese-led-bank>.

^② 陈丽丹：《朱光耀在美重申：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人民网，2015年4月1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18/c1002-26866593.html>。

^③ John Kerry, “Remarks at the Sixth Round of the U. S.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July 9,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7/228910.htm>.

突出，而对话合作共赢处于次要地位甚至被排除在外。正如中国著名学者王缉思近期所指出的，近三四年来“中美战略互疑加深了”。^①

3. 隐喻推理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是历史类比隐喻，属于同域映射，因此源域中的对外政策会通过隐喻推理套用到中美博弈中，即守成国要保护盟友、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崛起国的挑战来维护自己的霸权秩序。这种隐喻式的推理和所采取的相应对外政策行为，很容易造成双方战略误判，产生更加激进的对外政策行为，这一点在中国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上文在“利益攸关方”隐喻部分所指出的，自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美国在中国南海领土问题上基本持不选边站的模糊战略，总体上将南海问题与美国自由航行问题分别看待。但是，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怂恿、支持东盟个别国家挑起南海议题，并未与中方事前沟通就发表了一份南海声明。其在2014年出版的《艰难抉择》回忆录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即她在该会议前几个月就开始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做得“过火了”，对该地区邻国“变得更加强硬”。^②可见，在她眼里，中国似乎有了“修昔底德陷阱”剧情中“崛起国”咄咄逼人的雏形。在2012年8月22日艾利森发表关于“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文章后的一个月后，美国参议院又举行了关于海洋岛屿争端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分会主席吉姆·韦布在开场中几乎讲述了一个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故事。他指出，自2009年以来南海主权争议和冲突风险不减反增，近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更加愿意使用武力，如干扰美国“无暇”号、切断越南和菲律宾执法船的电缆。他说，“过去一年中国的行为是想进一步扩张在南海行政和物理控制面积”，因此“今天引起的担忧就如同上世纪30年代对日本和我80年代在国防部工作时对苏联的担忧那样来得迅速”。^③这种认知很快被推演到政府采取的对外政策上，例如，2013年美国宣布了对菲律宾和东盟地区的两个安全援助计划，后者中有一半金额用于越南。美国不断派军舰和飞机到南海挑衅，从2009年的260余架次增加到2014年的1200余架次。^④对于这些行动的逻辑，美国

^① 王缉思：《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FT中文网，2016年5月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422? page=2>。

^② Hillary Clinton, *Hard Choice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4, p. 68.

^③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Asia”, Opening Statement by Senator Jim Webb, September 20, 2012,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pp. 1-5.

^④ 邱越：《专家：美国频繁抵近侦察监视中国南海三大建设》，人民网，2015年7月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703/c1011-27247801.html>。

防长哈格尔在 2014 年香格里拉对话中讲得十分明确：“正如奥巴马总统本周早些时候所言，‘美国必须在世界舞台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中国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行动来主张其在南中国海的声索。它限制了黄岩岛的进出，对菲律宾长期在仁爱礁的存在施压，开始在多处填海，并将钻井平台移入西沙群岛附近的争议水域……我们坚定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或者武力威胁来主张这些声索。我们也反对任何国家旨在限制飞越或航行自由……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做出选择：团结起来重新致力于稳定的地区秩序，或者背离这种承诺，危及惠及整个亚太数以亿计人和全球数以十亿计人的和平和安全……对于所有国家，选择已经非常明确，利益重大。这些利益并不只是岩石岛礁主权归属或者其周围和地下的自然资源。它们牵涉亚太基于规则秩序的可持续性。”^①

对于美国来说，南海问题已经不仅是各声索国领土主权争端和普通自由航行的问题，而是地区秩序问题。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 2015 年 9 月 17 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讲话更是印证了这些政策行动背后的“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推理逻辑。他指出航行自由权不仅事关全球经济，还攸关美国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将与盟国开展常态化自由航行行动，通过保持强有力的存在来“传达美国决心的信号”。^②造成这种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推理方式改变了中美双边对于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即中美任何一方的行为都被对方理解为国际和地区秩序之争，并以此推导出相应的对外政策，“修昔底德陷阱”隐喻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③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建构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推理不可避免地将中美关系的矛盾塑造为世界秩序和领导力之争，因而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破解。从目前来看，中国主要采取了三种应对方式：正面回应、解构“修昔底德陷阱”含义、寻求替代话语。第一种方式是正面回应，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以习近平的两次讲话为代表。第一阶段是 2014 年初习近平首次对此直接回应，指出中美都应“共同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不认为其适用于中

^① Chuck Hagel, “Speech at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May 31, 2014, <http://archive.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857>.

^② Harry Harris,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 o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7”, September 17, 2015, <http://www.pacom.mil/Media/News/tabid/5693/Article/617677/statement-before-the-senate-armed-service-committee-on-maritime-security-strate.aspx>.

^③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p. 156.

国。^①这意味着间接承认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第二阶段是2015年9月访美期间,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2015年首次公开回应,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②这种正面回应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美双方领导人共同表态否认“修昔底德陷阱”是十分必要的,但其本身并不能解除已经沉淀在人们脑海中的认知框架。这种“框架”仍存在,只要相关事件发生,随时都可以激活人们脑海中的框架。第二种方式是解构“修昔底德陷阱”隐喻。秦亚青在探讨中国和平崛起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是关系取向,认为对立事物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相互建构、互为条件,一方消失,另一方便会消失”的阴阳辩证法,^③因此,西方那套“对抗冲突”思维不适合中国。钱乘旦等人更是直接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与史实不符,是个“杜撰的理论”,套在中美关系上更是“张冠李戴”。^④实际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根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修昔底德的判断是不成立的,他指出有充足的资料证明在战争前雅典没有不断扩张,“它对现状感到很满意”,而“斯巴达人也没有对雅典表现出过分的担忧”,两国本可以“和平相处”。^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勒博也不同意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⑥这种解构对于破解该隐喻是非常有益的,但其能否有效传播给大众、获得话语优势还有待观察。第三,破解“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最根本的方法是提出替代隐喻。例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使用“夫妻”隐喻解释中美关系,^⑦阎学

① 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 *The World Post*, January 21,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1/21/xi-jinping-davos_n_4639929.html.

②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第2版;杜尚泽、李博雅:《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第2版。

③ 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12页。

④ 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参考消息》,2016年8月24日,第11版;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页。

⑤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370页。

⑥ Richard Ned Lebow, “Play It Again Pericles: Agents, Structur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2, 1996, pp. 231-258.

⑦ “U. S.-China Relationship Like a (straight) Marriage—China’s Wang”, Reuters, July 10,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dialogue-humor-idUSBRE96911Q20130710>.

通提出中美竞争是“足球而非拳击比赛”。^①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隐喻传播效果有限，还没有进入中美双方听众尤其是美方听众大脑而形成隐喻框架。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层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力图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四、“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关系展望

鉴于界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利益攸关方”隐喻框架逐渐失效、“修昔底德陷阱”隐喻肆虐，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来厘定中美双方对于中美关系的认知。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时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②中方的提议也基本得到美方的认可：2013年3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在阐述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时说，要“构建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2013年11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中也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实施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3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再次确认双方“都致力于继续加强和建设我们两国的新型关系”。^③

“新型大国关系”属于常规隐喻，对中美关系做出了与“修昔底德陷阱”隐喻相互竞争、愿景完全相反的对外政策预测。它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根本框架”。^④它将中美关系议程框定在管控分歧冲突和推进合作共赢方面，确实为

^① 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 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2, 2012, pp. 105-127.

^② 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2年2月17日，第2版；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版。

^③ 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March 11,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president-united-states-an>;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March 24, 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3/24/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china-bilateral-meeting>; Susan Rice,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Rice”, November 20,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1/21/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

^④ 戴秉国：《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戴秉国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谈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2016年3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49192.shtml>。

两国增进互信、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最初认为它是对世界银行等金融制度的“另起炉灶”，采取反对和遏制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框架思考和行事的。但是，经过中国政府反复沟通，强调亚投行只是对现有金融秩序的补充，美方逐渐改变了看法，美国总统2015年4月表态不反对成立亚投行，并表示支持。^①

但是，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提出的一个概念隐喻，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接受和消化它还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甚至还出现了反对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声音，因此要将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转变为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理解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此外，从隐喻类型来看，新型大国关系属于常规隐喻，相比之前的“利益攸关方”和“修昔底德陷阱”等新奇隐喻来说，缺乏语言上的“新奇性”，相对来说更难博得听众尤其是美国公众的“眼球”。

因此，下面我们将从隐喻认知的角度分析“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的建构问题。首先，从话语接受者的视角看“新型大国关系”隐喻的意义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个新概念，面对的是两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听众群体，很容易产生不同效果甚至误解。例如，“新”字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基本上都是褒义的，如“新青年”、“新中国”、“新时代”，对于中国听众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天然具有褒义的色彩，很容易接受。而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new”在美国政治话语中褒、贬、中性都有可能，不会像在中国政治话语中具有那么强烈和广泛的褒义色彩。就“新型大国关系”英文“a new model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中的“new”来说，它不会有中文语境中的那种“褒义”预设。^②同时，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领导者，“新”本身可能预设着对当今秩序的改变。其次，虽然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界定“新型大国关系”隐喻的内涵，中美双方在避免冲突、加强合作和坦承分歧方面具有共识，但是由于词语的意义取

^①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pril 28,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4/2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

^② “新型大国关系”的常见英文说法还有其他多种，如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 new model of major-power relations,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等等。对于这些英文短语中的“new”，笔者在美国学者中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该词在这些短语中暗含褒义色彩，基本认为该词是中性甚至贬义的。其实，中西方对于“新”的理解差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新北京，新奥运”的英文翻译中就表现得很明显，“新奥运”翻译成“Great Olympics”。当然，笔者并不是认为要删除或者重新翻译“新”，而是说明其理解意义的差别。

决于该符号与语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差别，“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语境下也会产生一些错误的隐喻推理，主要包括：中方坚持新型大国关系要求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是美方无法知晓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担心为中国扩张背书；中国所指的大国只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而不包括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有忽略美国盟友之嫌；甚至有美国人认为，接受这个概念意味着中国在东亚建立势力范围，美国为避免冲突而安静撤出。^① 美方的这种误解显然与“新型大国关系”隐喻具有巨大阐释空间有关，因为该隐喻本身就很抽象，例如“新”是什么？“新”到什么程度？虽然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内涵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在跨文化交往中则不尽然。隐喻源域意义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意义映射和推理，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固定”该词在中美两国语境中的含义。除了解释沟通方法外，更需要通过具体、喜闻乐见的事例，以一种直观化的方式让听众尤其是美国听众强化对其正确的理解。否则，在美国这种民众常年经受政治“口号”轰炸的国度，“新型大国关系”很可能被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而被过滤掉。^② 当然，在政治话语中出现歧义是正常的，“如果不存在意义分歧，那它就不是个政治问题。”^③ 最后，“新型大国关系”的英文翻译有多种，但是每一种翻译似乎都是以一种普通短语形式出现，而不是像在中文中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名词，西方读者很难将其固化为一个概念。而且，绝大多数英文翻译都至少有五个以上单词组成，这就使该概念传播更加困难，因为英文中那些容易流行的概念都很短，一般不超过三个单词，比如“soft power”、“pivot to Asia”。

其次，“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传播除了每次中美接触时要反复提及，更要依靠相关概念隐喻的建设来支撑，特别是中美双方听众都易于接受的新奇隐喻。我们发现“修昔底德陷阱”隐喻不断蔓延的一个原因是，整个话语语境中“中国崛起”、“美国衰落”、“零和游戏”、“权力转移”等隐喻构成一个网络支撑和激活“修昔底德陷阱”认知框架，构成该框架的“格式塔回路”。^④ 当前，中国已在提出和提倡一些有益的概念，如“共生”、“共赢”、“天下”等，但是还需要更多。在新奇隐喻建设方面，我们需要借鉴莱考夫

^① Jane Perlez, “China’s ‘New Type’ of Ties Fail to Sway Obam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2014, A8.

^② 有些美国人认为该概念是中国的宣传口号，例如 Andrew S. Erickson and Adam P. Liff, “Not-So-Empty Talk: The Danger of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logan”,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October 9, 201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4-10-09/not-so-empty-talk>.

^③ Murray Edelman, “Political Language and Political Reality”, p. 12.

^④ 关于“格式塔回路”，可参见 George Lakoff, “The Neural Theory of Metaphor”, p. 21.

提出的五原则：（1）隐喻应该突出某些特征，同时掩盖其他特征；（2）隐喻不仅仅要蕴含其他概念，更要蕴含这些概念的具体方面；（3）隐喻要赋予本体新的意义；（4）隐喻要能支持行动，为推断提供理由，并能帮助设定目标；（5）隐喻要与文化和过去经历产生共鸣，从而自然地忽略掉它掩藏的方面。^①

再次，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时要尽量考虑“别想那只大象”的认知规律。“别想那只大象”规律是莱考夫在《别想那只大象：知晓你的价值观，框定辩论节奏》一书中提出来的。具体而言，就是当一个人反复向人们说“不要想那只大象”时，人们会发现我们不但不会停止想象大象，而且还会深陷其中。^②这里的“大象”就是一个认知框架，当我们试图去否定它时，我们其实是在激活这个框架。因此，框定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当我们试图反对另外一方时，不要使用对方的语言。艾利森教授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时巧妙地运用了这一规律，他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的三篇重量级文章都是打着中美需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招牌，不知不觉中便将“修昔底德陷阱”框架植入人们的头脑，结果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心里都有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当前，中国在倡导“新型大国关系”时，常常会伴随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甚至长篇大论探讨“修昔底德陷阱”的错误和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激活或者强化这种概念。^③中国在框定中美议程时需要考虑这些议程设定的认知规律。

最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型大国关系”和“修昔底德陷阱”对于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解释还会存在，将引导着中美关系向不同方向发展，因此，未来我们很可能面对的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关系。这种冲突与合作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已有的认知以及对未来经历事件意义的阐释，而隐喻为我们理解和建构这种认知和意义阐释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事实上，掌控公共领域隐喻的使用已经成为“获取和保有权力”的方式。^④

①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pp. 481-482.

② George Lakoff,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③ 笔者认为中国正面回应“修昔底德陷阱”是必要的，旨在表明战略意图，但是媒体和学界过多地直接使用和讨论这一隐喻，其实就已经掉进了该命题的认知“陷阱”。

④ David Punter, *Metaphor*, p. 47.

五、结 论

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我们理解对外政策和语言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深化人们对于国际关系中语言建构性的认识。虽然近二十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语言的建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对于语言的内在建构机制或路径关注较少。隐喻是研究语言建构机制的重要视角，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离开隐喻人们几乎无法交流和思考。将隐喻作为基本分析对象引入对外政策分析，有助于揭示语言是如何将客观世界转化为认知进而影响身份和对外政策的，从而充分展示出语言建构而非仅仅反映国际关系现象。为此，本文在借鉴认知语言学、政治心理学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一个分析隐喻建构对外政策的分析框架，即隐喻通过“映射”选择性地建构国际关系现实，构成对外政策的认知基础，通过隐喻的“框架”作用框定对外政策的议程，通过“隐喻推理”建构对外政策的选项。我们通过对中美关系中两个典型隐喻“利益攸关方”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分析，发现尽管两者提出时的初衷几乎都是希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但是正如隐喻框架所预示的那样，两者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利益攸关方”认知“滤镜”下的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更积极、更强调利益共存的一面，双方的议程主要集中在寻求共同利益和合作方面，对于双方意图的推理更倾向于积极方面；而“修昔底德陷阱”隐喻会自动选择双方关系中的负面内容，将双方锁定在对抗和冲突模式中，对于任何事件和行为倾向于从敌对方面加以推理。这一案例对比充分表明了隐喻在对外政策中的建构作用。

同时，上述隐喻案例研究也表明，中美关系是可以建构的，而并非是“宿命”的，不同的隐喻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中美关系“现实”，导向不同的对外政策和行为，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大力倡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张意义重大。因为当人们在探讨建构作用时，其前提是这种关系能够被建构而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沿着某种既定方向发展。当前，很多西方学者担心“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被描述为“铁律”，给人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历史宿命感。但是，我们的隐喻研究解构了这种认知，认为它不过是人们描述现实和建构政策的一种隐喻认知方式，是人们认知中美关系的其中一种而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两国关系的另外一种图景。可以说，当

前中美关系话语中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隐喻之战”，一场关于中美关系认知的话语权之战，而非一个实然和应然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主动把握中美关系话语权的重要一步，为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及其话语解释争取主动权。

再次，隐喻的研究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话语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隐喻不仅可以用来解构西方霸权话语，更是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工具，我们可以通过隐喻重塑国际政治中的问题与解决方式。对于当前的“新型大国关系”话语而言，一方面需要加强“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网络的建设，因为隐喻的建构作用并非凭借单个概念隐喻就能完成，而是通过其背后的支持网络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在引入、讨论甚至批评某些西方概念时要注意辨别。当前资讯发达，再加之中国与西方话语态势的差距，很多西方话语轻易进入中国主流话语讨论议程，实际上挤压了中国自身话语的生存空间。我们发现，对于一种隐喻如“修昔底德陷阱”的过度批评其实已经不自觉地落入该隐喻的认知框架。破解隐喻框架的最佳途径有时不是反复批评它，而是让它淡出话语体系，不去激活它。试想如果美国报刊和学界天天讨论中国的“和谐世界”、“一带一路”等话题，无论是对其批评或者赞扬，不都是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吗？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更多的时候采取的方法不是辩论而是漠视。

最后，研究隐喻与对外政策建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说明隐喻建构对外政策本身，更不是说某个隐喻是绝对的好与坏，而是说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看清隐喻以何种方式框定了我们的认知与对外政策，从而能够找到这种框定对我们的政策愿景可能造成哪些潜在的风险，进而及时补救。例如，案例中的“利益攸关方”和“新型大国关系”隐喻虽然整体上正面，但是通过隐喻分析，其蕴含的“责任”和“新”含义都是可以大体预测到的。

（责任编辑：吴文成）